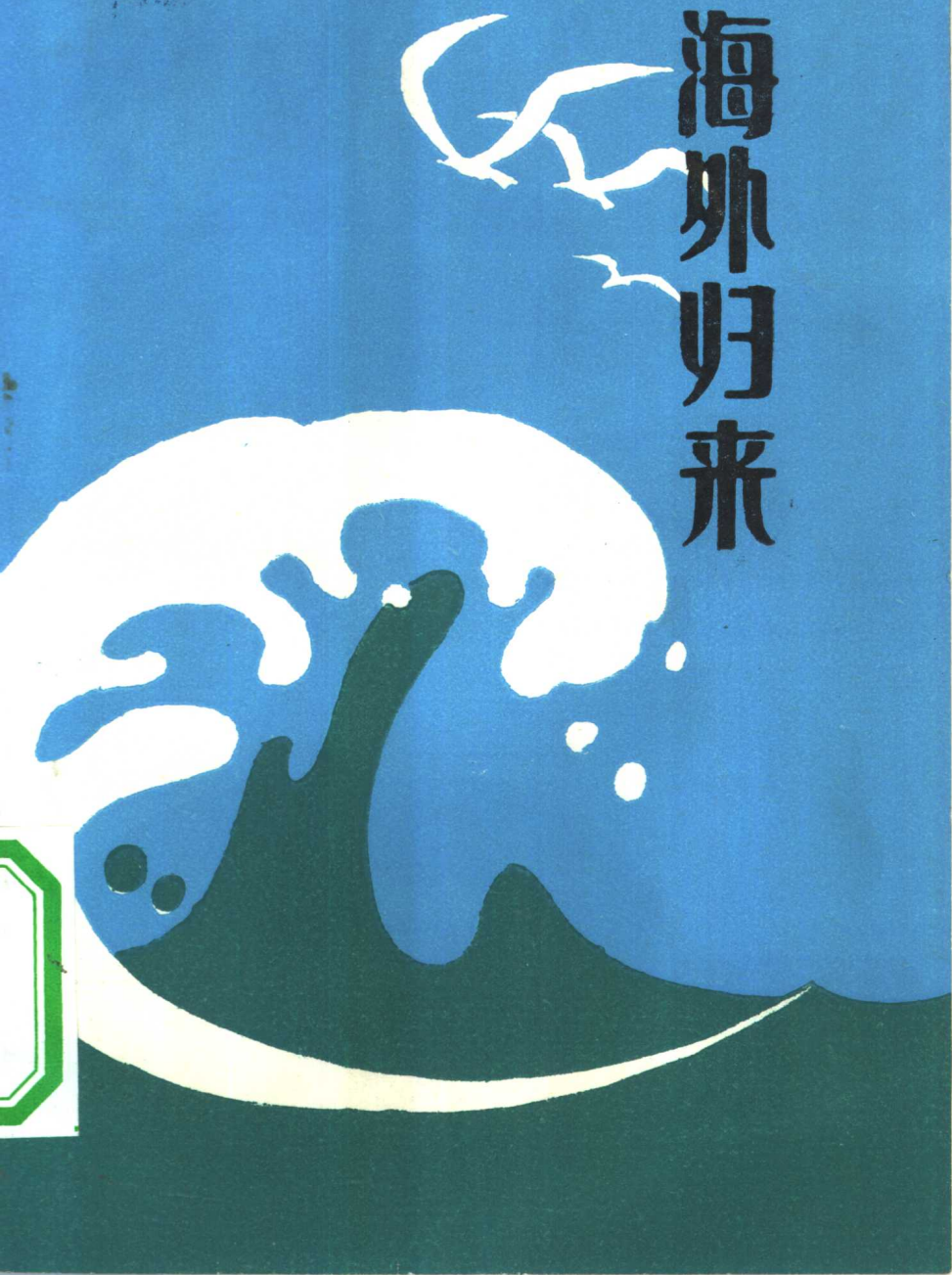


海外归来



海外归来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绍辉

封面设计：蒋敏学

海外归来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楚雄州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25 字数：62,000

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800

统一书号：3116·419 定价：0.25元

目 录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1
振兴中华 责无旁贷·····	5
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	17
一颗滚烫的爱国心·····	26
他离不开祖国和乡亲·····	32
祖国，我眷恋您！·····	38
他为中华腾飞出力·····	43
为了报答祖国母亲的恩情·····	48
我爱新中国·····	51
他为何去而复归·····	54
三年曲折路 一席肺腑谈·····	61
我去香港的前前后后·····	65
历尽严冬寒 方知春日暖·····	69
不切实际的幻想·····	77
美国青年剪影·····	85
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	92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记留学回来的浙江大学讲师路甬祥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从西德留学回来的浙江大学讲师路甬祥向学生作报告的题目。他在报告中说：“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把祖国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用最快的速度把最需要的东西学来

在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路甬祥连续做出了被评价为“崭新的八十年代液压技术”的五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五项专利。与此同时，他获得了通常要用五、六年时间才能获得的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什么力量推动着他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他时常想起1979年初出国前夕一位领导同志说的话：

“你们象一批种子，是国家挑选出来的，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回来要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他离开祖国的那天起，他就默默地下定决心：“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最需要的东西学回来。”

他到这个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按规定只有一年时间。

时间这么短，按通常外来学者的惯例，要先听基础课，再选科研项目。他确认自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决心打破这个惯例。进所第7天，就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并且说，我的祖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已经白白损失了10年时间，现在的每时每刻都太珍贵了！

教授理解他的急迫的心情，支持他选定了“电液比例技术”这一课题。这是一个把电子技术同大功率液压传动、控制结合起来的研究项目，具有重大意义。经过两个多月的理论分析，他向教授提出了大胆设想：改革沿用了一百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教授回答：“这完全是新的思想！”“很可能取得成功，值得尝试。”

从此，路甬祥广泛收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参观、游览和文娱活动。西德同事每周只工作5天，他连半天的休息时间也很难保证。每天夜晚，他所在的实验室的灯光，总是闪烁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中午，几片面包；晚上，一碗面条。巴克教授十分赞赏他的勤奋和刻苦，把所有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这样，在周末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有了更好的工作条件。

在艰苦探索的日子里，每当夜晚，时钟指向九点，路甬祥总要静静地坐下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欧洲的定向广播。很少写诗的路甬祥，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莫道在德一孤雁，背后自有十亿人！”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的“电液比例节流装置”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两项新原理，被誉为“出色的创造”。后来，他运用这些新原理，又接连作出了三项发明（其中一项是同巴克合作的）。去年5月，以优异成绩通过

博士论文的答辩。西德流体动力研究应用促进会接纳他为第一位亚洲会员。

他是祖国大地上萌发的一颗种子

亚琛工业大学巴克教授和同事们的真诚帮助，是路甬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是很感谢他们的。但是路甬祥认为，不能把这两年多的工作，和他的过去完全分开。他把自己比作祖国大地上萌发的一颗种子，靠的是祖国阳光和雨露的滋养。

当他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的时候，是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教导他立下学好本领为人民的美好志愿。从小学到中学，他各门功课几乎都是优秀，被评为三好学生。在课外，他又醉心于航空模型活动，曾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正是这些条件，锻炼了他的头脑和体魄，为他打下了从事科学实验的良好基础。

他更忘不了五年大学生活中，浙江大学“求是”校风对他的熏陶。他们的毕业设计就是真刀真枪，在工厂里完成的。这以后，他一直从事着电液比例控制方面的工作，整整十五年，从未停顿过。他和同志们一起，为工厂开办进修班、短训班，和进修工人一起到许多工厂维修各种机床。在坚持不懈的实践中，他逐步积累了关于磨床液压系统的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他和教研组的同事们一起，先后完成了5个科研项目，还参加了液压实验室的规划和设计工作……

正是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他才能在远离祖国的异邦做

出了令人注目的成果。

“我的祖国是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

路甬祥出国原定一年，后来，延长到两年零七个月。眼看归期快到了，路甬祥也更加忙碌起来。一些学术讨论会邀请他出席，有的工业博览会邀请他参观，美、英、西德等国几家世界最大的液压公司也争相认购他研究成功的技术特许权。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愿意给他8万马克年薪，还声称可以把他的妻子、儿女接去。亚琛工大研究所的巴克教授和同事们更是热情挽留他，向他说，“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研究所总工程师还提出给他5,000马克月薪，希望他长期工作下去。

面对着在国外优裕的生活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有礼貌地答复说：“感谢你们的盛情。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1981年9月，路甬祥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国家拨出专款，支持他和同事们一起建设流体传动与控制研究室。他在西德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在开始推广应用。他说：过去的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现在需要的是要看到将来！

《人民日报》记者 周祖佑

（原载1982年4月6日《人民日报》）

振兴中华 责无旁贷

南京工学院讲师 韦 钰

攻关夺隘的过程

1979年2月7日，恰好是我三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和同行的四十九位同志踏上出国进修的旅途。

临行前，我在南京工学院的指导老师陆钟祚教授对我说：“你出国负有历史的责任。”院和系的领导同志也找我谈了话，对我提了希望和要求。我们的老院长刘雪初同志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国工业不很发达，很多外汇是用一件件农产品换来的，你们在国外要想到这一点，要珍惜这个机会。”就这样，我带着领导和同志们的殷切期望，暂时离别了祖国。飞机在西德慕尼黑降落时，除了我国大使馆来人接外，还来了许多西德记者，要我们谈谈到西德想干什么，准备怎么干。这时，我想到不仅是祖国人民期望着我们学成回去，而且德国人民也注视着我们，他们想从我们身上看我国的社会制度，看我国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在慕尼黑只停留了几个钟头，第二天一早就飞到了汉堡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开始了我在西德的生活。

一闯语言关。我的德文基础不好，仅在研究生期间自学了一点，经过十年动乱也丢得差不多了。当学校决定叫我出

国时，我突击复习了一下。和当时在一起学习的同志比，我只是中下等水平。所以，在哥德学院学德语阶段我很吃力，也很着急。当时，由于不能用德语对话，我只好到中国餐馆吃饭。生活上也有困难。还有个时差问题，那里下午三点钟上课，刚好是国内上床睡觉的时候，所以老打瞌睡。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学。在那里学了七个星期，由于学费太贵，我就结束了第一阶段学习。这个阶段只是学了一些日常用语来应付我的生活。

从1979年4月1日起，我在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学习。亚琛工大本来叫皇家工业大学，是西德第一流的工业大学，有学生二万七千人，其中外国学生占百分之十二。我刚到亚琛工大高频研究所时，只能看懂一些书，还听不懂讲课，更不能和他们进行学术讨论。因此闹了许多笑话。比如，第一次去见指导老师杜林教授，我想应该争取主动，就预先把我过去干过什么，到这里想干什么，写了个稿子，而且花时间去背熟了。见面问好之后，我就把准备好的腹稿一口气背下来了。杜林教授一听，很惊讶我竟有这样的德语程度。因为他知道我只学了七个星期，前面都是自学的。但深谈之后，便发现我根本没听懂。他见我急得满头大汗，就对我说：

“你以后跟我们的助手一起去吃饭。”因为那里工作时间很紧张，只有中午吃饭时的一小时可以交谈，可以帮助我学习语言。可是当时我很慌，只听懂了“吃饭”这个词，就对杜林教授说：“不，我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学习的。”杜林教授很友好，当时没笑我。高频研究所的同事以后都知道了这个笑话，只要我们聚餐时，他们就对我说：“韦女士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学习的。”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必须首先

过好语言关。于是，我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学习语言。白天听课，凡是和我专业有关的课我都去听，中午和助教们一起去吃饭，下午我和同学们一起上习题课，晚上和同学们一起做试验，回到宿舍再接着学德文。我利用每月十几马克的零用钱，积下四十马克买了一部旧电视机。当我在宿舍里实在看不进书时，就打开电视学语言，直到实在没力气时才休息。到了假期，我就帮助西德女学生烧中国饭菜，让她们和我讲德语。相处熟了，我请她们把课文预先给我读，让我先多听几遍，这样我上课时也能听得懂了。经过约四个月的时间，我的德语就基本过关了。对这个速度，所里的同事和教授都很满意。

二闯计算关。我出国前，还没有见过计算机。但对于学电子学的人来说，没有计算机就不能很好工作。学习计算技术时，正好是亚琛工大的假期，杜林教授要去休假了。亚琛工大的外事局对我们十分友好，组织在那儿学习的九位中国学者游览西柏林。这时，我因还有许多工作没做，不能离开亚琛，就谢绝了外事局的邀请。杜林教授知道这件事后，也很支持我的做法，临走时对我说，既然你要学计算机，这里有一个题目，你拿去算算。这个题目，是他三十年前做教授论文的题目，他当时应用的是“小信号”理论，很希望这道题能在“大信号”中求解。以前他曾把这道题交给其他国家来的进修学者和一些学生做过，一直没有得到一个使他满意的结果。我接到这个题目后，就去请教另一位教授，请他告诉我该怎么学习计算机。他说：我告诉你的只有“大胆”两字。于是，我就开始了实践，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闯过了计算机关，杜林教授交给我的题目也有了初步结果。不到两

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这个题目完成了，接着完成了杜林教授的类似的另一个题目。

这时，杜林教授等认为我应该得到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就向洪堡奖学金委员会推荐。经过奖学金委员会的挑选，我获得了洪堡奖学金，这在西德也是一个例外。因为按规定：外国人到西德本土超过三个月就不能再申请。另外，申请必须在挑选委员会开会前四个月提出来。那时，我到西德已七个月，根据杜林教授建议写的《洪堡奖学金申请书》，在挑选委员会开会前一个多月才送去。但是，他们看到我的学习、研究情况，表示愿意作为例外处理。我享受洪堡奖学金后，就不再需要国家供给我学习费用了。

三闯博士论文关。根据我第一年的学习情况，杜林教授建议我把原来的一般进修改为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我下不了决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洪堡奖学金，如果要做博士论文，就要延长时间，就要多花国家的外汇，我把这事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南工的领导和指导老师及时给我复了信。他们说：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和学校荣誉的问题，哪怕再延长一年、二年，你也要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我就下决心攻博士论文。后来，从阅读资料到论文核心的完成，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回国后，很多人要我具体说说这八个月紧张到什么程度，我说：现在很难形容。反正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个事。在10月份第五届红外和毫米波国际会议上，我和杜林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的论文，获得了好评。会后，又做了些补充和书写论文的工作。6月16日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的考试，而且得了最优秀的分数。在亚琛工大，如果得到了

最优秀分数，就授予博歇尔奖章。这是以创办亚琛工大的校长命名的一种荣誉奖章。我们系里那一年几十个获得博士的人中只有两个人获得了这种奖章，另一个是德国人。七月份亚琛工大的结业式上，校长把奖牌授给我时说，这是授给第一个来自人民中国的人。

四开辟科研新领域。我完成论文以后，对还可享受半年的洪堡奖学金，有两种处理的办法：一、我回国，把这个奖学金留在那里，什么时候需要再到西德去，这是符合洪堡规定的；二、我继续留在西德学习。这时，我向南工的陆老师他们写了信，说明我虽然离开家很久了，博士学位也已经拿到了，但还想再坚持半年，为我们研究所，为我回来以后教学生，开辟一个新学科，再学习一点东西。我向杜林教授谈了我的想法，开始他很不理解。他说：你在“回旋管”上千下去可以轻松地得到成绩，因为已经建立了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如果再去开辟一个完全陌生的学科，那困难是很大的。我反复对他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要为我的学生，为南工研究所找一个新的方向。最后教授还是理解了。这样，我在论文考试完后，又开始了新的任务。由于我是第一个在西德搞“回旋管”研究的，我的论文完成以后，西德科学协会拨了一笔专款在高频所建立了一个科研点，我离开时，要把这个工作交下来。我帮他们带了一个研究生，专门接替我工作。另外，我和杜林教授一起准备了一篇论文到第六届国际红外和毫米波会议上发表。除了这两项工作外，我干脆到另一个研究所，在那儿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西德的一些研究所和大学调查有关生物电子学的情况，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回国开辟这方面的学科

作准备。

治学之道的探索

在考试完毕的那天，按照研究所的传统，晚上都到一个小酒店去喝啤酒，表示庆祝。当时有的同事说，韦女士好象都是按最佳方案在那儿干。要我作介绍。杜林教授也说我这样是做博士论文的典范。那天从酒店回来已经很晚了。我很激动，根本不想睡觉。我反复想，主要有如下三点体会：

一、知识在于积累。我是在南师附中读高中的。那里的师资很强，有的是留学生，但他们坚持在中学教书。学风也很严谨。我们那时都住在学校里，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要读外文，早自习以后，才去吃饭，晚上要上晚自习。在这么严格的学习环境中，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养成了刻苦和严谨的学风。在南工五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不满足于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总希望能多学点东西。通过努力，二十七门功课门门优秀。我在南工毕业以后，留下当陆老师的研究生，陆老师带着我们一批年轻人，创建了电真空研究室，就是现在的电子学研究所。在四年的研究生期间，陆老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所写的论文，包括错别字、标点符号，他都仔细修改，提出意见。就是在这样的培养下，养成我们一种比较严肃的科研作风。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西德这样短的时间里，找准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论文题目。在我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杜林教授曾经建议我沿着一个美国人的方法做下去。我读完了我所能得到的所有资料，研究了方案，最后，对杜林教授说：我准备把苏联和英国两个人的方

法组合起来，从那里作为我研究的出发点。事实证明这个路子走对了。在我得到博歇尔奖章的时候，校长做了一点介绍，说我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所以当天晚会时，许多人跑来看我，他们觉得很稀奇：一个妇女能够这么快完成论文，不容易！他们问我，象你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多少？我说：我的同班同学中就有许多，而且比我更行，我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人。

二、才智在于勤奋。中国留学生在西德是以勤奋著称的。西德有一个专门管留学生的官员，一次到亚琛来开会，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当心啊，现在到处反映你们不休息，而且没有社交活动。这就说明到西德学习的留学生都是很勤奋的。要取得一点成就，不付出艰苦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那儿是没有星期天的。西德同事是五点钟下班，而这时正是我们新的学习的开始。因为我们搞电子学的人必须用计算机，五点钟下班后，计算机最空。所以，一等西德同事下班，我们就坐在计算机面前开始工作。星期六和星期日，是他们的休息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最好时间。我们可以从星期五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一的早上连续使用计算机。有的时候，西德同事也来加班了，我们就说，你们怎么也来加班了？他们说：“都是你们带的，你们加班，我们不加班，教授就要骂我们了。”这说明中国学生在那儿的影响。有时候，教授怕我们工作太紧张，就买好了音乐会票，希望我们能够去听音乐会。只要教授出差去了，我们就赶快把音乐会的票子送给别人。教授回来知道了很生气，因为音乐会的票子是很贵的。他说，好不容易给你弄张票子，你还不去。我回答说，我们没有时间，等工作做完了，我们再去听音乐

会。教授说：哎呀，等你们工作做完了，你们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有一个老毛病，在工作很紧张的时候，就觉得血都往头脑上冲，有的时候鼻孔会突然地喷出很多血，在搞论文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我论文核心工作基本完成、准备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到医生那里检查以后，医生建议马上住院治疗，我想到这要影响研究进程，硬是吃中药挺了下来。当时我到西德时间不长，要把整个论文用德文写下来，并非容易。我首先用中文写，然后翻译成德文，再自己修改一遍，打印成一稿，送给教授看。教授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行要退稿。再修改，再打印，再给他看。光是这样，反反复复写的草稿就有半个桌子那么高。当教授把稿子审查出来以后，我自己还要把它打印一遍，然后才能送给秘书，作为正式稿。为了写稿，我带去的两套西服的口袋都挂破了，因为走路象跑步一样，在楼梯拐弯处有一个桩子，老是勾住我的口袋，简直没有办法补。在那个阶段，有时走在楼梯上还要摔下来。当我把论文稿交出的时候，研究所的同事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说：看你那么紧张，把我们的神经也弄得紧张了。事实证明，真正要做成一点事情，想不付出艰苦的劳动是不行的。

三、成功在于信心。有了基础，有了勤奋的学习态度，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在关键时刻敢不敢拚搏，即有没有信心。这个信心，在我遇到很多困难时支持了我。有人说，女同志过了四十岁脑子就笨了。在这时候要去掌握一门对自己来说基础不很好的外语，没有信心，没有一点拚劲，是不可能过这个语言关的。另外在西德很少有妇女学电子学。在会议上，在教室里，我往往是唯一的妇女，所以经常发生这种

情况，因为没有女的学电子学，人家开始作报告时，总是说“诸位先生”，一发现我坐在那儿，马上就讲，“对不起，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这说明在西德电子学不是妇女的专业。杜林教授曾经带了近八十多个学生，我是他第七十五位学生，是仅有的一个女学生。我是个妇女，又是在不大有利的年岁到西德，不仅学了电子学，并想在亚琛工大电机系完成博士论文，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亚琛工大是德国第一流的学校，特别电机系是很骄傲的，或者说是很保守的。它一般不承认别国的大学学历，除了几个著名的大学，譬如英国剑桥。中国即使是研究生去，它也不承认。他说你要作博士论文可以，但是你先要和我们的毕业生一道考好两门课。这样一来又要延长我的学习时间，我相信我在国内学的东西，不能答应这个条件。我向杜林教授表示，我完全有信心完成这个论文，而且相信我不需要进行考试。当我的论文核心完成后，系教授委员会讨论了我的情况，他们觉得可以为我破例，但需要三个教授对我专业情况写出鉴定。这三个教授是由教授委员会提名的，我必须去见他们。其中有一个教授是非常厉害的，不仅外国学生怕他，而且西德学生也怕他。研究所里的一些同事很为我担心，他们对我说：“见这个教授你得当心点。”我向这位教授介绍了我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和在西德的研究情况，也回答了他的问题。结果这个教授很满意地对我说：“你可以告诉杜林教授，继续作好你的论文吧。”当我出门的时候，连他的女秘书都跑过来和我握手，表示祝贺。她说：“祝贺你在这里能顺利地通过。”我觉得，在我们工作中有很多关键的时刻，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关口，这个时候横横心，拼一拼也就过去了。我还想讲个例